

博物馆学的思考

BOWUGUANXUE DE SIKAO

徐
玲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博物馆学的思考

BOWUGUANXUE DE SIKAO

徐
玲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物馆学的思考/徐玲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645-5883-3

I . ①博… II . ①徐… III . ①博物馆学-研究 IV . ①G2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5826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8.25

字数:345 千字

版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5883-3

定价: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博物馆与博物馆学	1
第一节 博物馆是什么	1
一、博物馆起源	1
二、场所、机构或空间	3
三、博物馆功用	7
第二节 作为学科的博物馆学	19
一、“博物馆学”术语	19
二、博物馆学研究对象	20
三、博物馆学方法论	22
四、新博物馆学	23
第三节 中国博物馆学的发生轨迹	25
一、近代博物馆学研究的起步	25
二、20世纪50至60年代博物馆学的初步发展	29
三、20世纪80至90年代博物馆学的进一步发展	31
第二章 博物馆物的探究	43
第一节 物的博物馆化	44
一、博物馆化的本质	44
二、博物馆物的原真性标准	46
第二节 博物馆物的变迁	52
一、馆内的种类增长	52
二、馆外的空间、种类拓展	56
三、物的突破：无形文化遗产的进入	58
第三节 博物馆物的诠释及伦理	60
一、博物馆物的分类	61
二、博物馆物的象征意义	64
三、博物馆物的区隔“他者”性	68
四、博物馆物的伦理性困境	71
第三章 博物馆服务对象的探讨	81
第一节 早期博物馆的精英性	81
一、博物馆私人收藏传统与精英意识	82

二、早期博物馆精英性表现及影响	88
第二节 民主观念下的博物馆大众转向	97
一、早期精英倡导的大众化	97
二、停留在政治层面上的大众化	106
三、大众诉求下的大众化	118
第三节 精英与大众之间	140
一、博物馆的选择性悖论	140
二、博物馆的均等与均质服务	164
三、精英与大众关系的思辨	167
第四章 博物馆教育理念的变迁	191
第一节 从奇观到知识:早期博物馆教育行为的萌生	191
一、博物馆教育产生的时间	192
二、欧洲早期收藏文化的奇观化(Spectacle)现象	193
三、收藏文化的奇观化实践及影响	207
第二节 近代博物馆模式下的博物馆教育理念	213
一、近代博物馆早期教育理念产生的背景	213
二、近代博物馆的早期教育实践	215
三、博物馆教育的常态化	219
第三节 从教育到学习:博物馆教育观念的内涵转换	228
一、参与式教育理念	229
二、从教育到学习的转向	234
第四节 博物馆美育、娱乐教育的思考	237
一、博物馆与美育	237
二、博物馆教育的娱乐性与娱乐化	245
参考文献	272
后记	285

第一章

博物馆与博物馆学

自博物馆产生以来,什么是博物馆的问题就一直存在多种答案。纵向看,博物馆定义具有流动性,随社会变化而不停地变化;横向看,除却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的定义外,各个国家、地区尚存不同的博物馆定义。一定程度上,围绕博物馆、博物馆学定义的讨论、争议及思考等,构成了博物馆学研究最为基本的议题。在此,通过梳理博物馆史上的种种代表性观点,就博物馆、博物馆学基本概念性的议题做一思考。

第一节 博物馆是什么

概念的界定,需要从内涵和外延两部分入手。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博物馆”概念的难以界定,不仅表现在其概念内涵的丰富、复杂及不确定性与外延的持续变动性方面,同时,博物馆也难以摆脱其形成、发展所在地政治、经济、文化及艺术等的影响。自博物馆在欧洲语境中产生以来,对其内涵的理解就充满了歧异。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曾经发出如此之问:“如何定义博物馆?借由概念模式(博物馆、遗产、制度、社会、伦理、博物馆域)、借由理论与实务的思考(博物馆学、博物馆实务)、借由运作模式(物、收藏、博物馆化)、借由不同的角色(职业、观众)或借由其延伸出的功能(保存、研究、沟通、教育、展览、中介、经营、建筑)?”^[1]感叹这么多可能的观点如何在博物馆定义中进行适当表述。

一、博物馆起源

“博物馆”界定的困难,首先表现在其起源的多元争议上。有关博物馆

起源的研究观点仍处在各持其说的状态,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一是从英文“museum”的词源“mouseion”追溯至古希腊神庙的“神殿”说。该观点主要依据是“mouseion”在拉丁文中最初表征的含义就是“缪斯的居所”或者“思考的场所”,而古希腊许多著名神殿设置了专门的宝库来收藏各种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以及从其他场所获得的战利品和雕塑品等。另一是约公元前285年建成的亚历山大博学园(Alexander lyceum)说。该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当时的亚历山大博学园内设了专门的收藏所——用来收藏动植物、矿物标本和古物标本,以备学者研究和学生学习使用,具有明显的博物馆形态。此外还有博物馆源自中世纪的教堂、国王及贵族的“收藏所”说,依据是中世纪的教堂、私人收藏所等收藏古物并有一定的展示活动;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珍奇屋”“学院”说等,依据是1605—1615年英文“museum”出现后,不胜枚举的希腊学院皆以“museum”命名等。但反对观点认为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时的各种博物馆形态仅是为博物馆的广泛出现而搭建的舞台而已。

影响所致,业界对博物馆早期具体概念范式的认识直至目前仍未达成相对一致,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概念模式就有五种,按照顺序依次是圣地范式、殖民主义范式、资本价值范式、后博物馆范式、发明遗产范式。圣地范式中的博物馆被视作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神圣之所,在此博物馆接受观众的顶礼膜拜,博物馆物成为民众崇拜的对象,具有某种治疗的潜能;殖民主义范式下的博物馆则是殖民主义通过“他者”的意象以确定和确认“我者”的空间和场景,具有强烈的政治权力性“话语”特征;资本价值范式强调博物馆是一个收藏的地方,兼具产业性质,必然受到资本化市场导向的制约,博物馆因此与商品具有极大的联系;后博物馆范式着重强调博物馆是一个能够建立让世界不同文化有机会平等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发明遗产范式强调博物馆收藏是对历史“碎片”的重组。博物馆可以重新组织、修复和诠释历史的“碎片”,进而成为“收集不同事物的盒子”^[2]。

实际上,17世纪末博物馆形成早期,已经开始寻找其古典定义的源起了。探寻过程中,菲利波·博纳尼(Filippo Bonanni)依照记载尝试还原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的博物馆并对其进行仔细研究观察后,认为“画廊”一词用于形容画廊主要是因为画廊富丽堂皇的物理形态,而不是“因为这里的收藏有问题”,只是:“其被不恰当地称为‘画廊(galleria)’。更为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博物馆(museo)’。”进而认为早期罗马学校的画廊应该是博物馆源头之一。而普林尼(Pliny)则指出“博物馆”这个词源于希腊语,因为斯巴达(Spartan)在其阿德里安的生活中也讨论了博物馆,即如“博物馆”所意指的是供奉缪斯的场所^[3]。其后法国学者比代(G·Budé)在《希腊语-拉丁语词典》(Greek-Latin Dictionary)中将“博物馆(musaeum)”一词解释为

“供奉缪斯、从事研究之处所”^[4]。此后博物馆源起古典时期的缪斯圣所之说开始流行,即“以缪斯、女神和美术守护神的名义,无可争辩地成为博物馆的源头”^[5]。

以缪斯圣所为博物馆源头的观点中,并无对博物馆边界的具体限定,花园、丛林等大自然现象均被视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是缪斯徜徉的主要场所。普林尼在《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一书中甚至还将窟龛与博物馆相提并论,认为博物馆的形象如同潜在的田园景象,是供人沉思的场所。普林尼之后的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 H. Gombrich)则提出“圣所类型”是艺术博物馆的两个祖先之一^[6]。同样,特奥多罗·邦迪尼(Teodoro Bondini)也持博物馆源自缪斯“圣所”说,“尽管大部分前人认为缪斯的名字只能用于指代歌曲或诗歌的守护神,但其他很多人仍然希望这个名号能容纳所有的知识。”^[7]但令人疑惑的是,自中世纪至16世纪后期,“博物馆(musaeum)”一词使用却较少。直至16世纪后期,法语中的“博物馆(musée)”一词还没有出现在任何一部词典中。尽管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重新使用“博物馆”一词的现象,但是强调的却是与古典智慧的连接,而非缪斯圣所之义。一定意义上,整个14及15世纪,欧洲热衷谈论的缪斯式收藏及生活方式,是导致后人将缪斯圣所与博物馆类比的主要依据。事实上,16世纪后期,与“博物馆”词义更加接近的是在欧洲迅速增多的“研究室(studies)”一词。1543年,有人就直接以“博物馆”来称呼——富有学术研究意味的——“研究室”:“最不可思议的是一间挂满缪斯画像的房间,每幅画中描绘一位缪斯女神,而每位女神都拿着各自的乐器……把这间房间称作博物馆再合适不过。”^[8]由此可见,博物馆是缪斯在俗世居所的观念影响甚大。

16世纪出现的对应表达“博物馆”形态的“画廊(gallery)”和“珍奇屋(cabinet of curiosities)”在博物馆起源研究中也独具影响。“画廊”主要指宽敞而狭长的展览空间,经常被用来展出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品,如前文所述,博纳尼就认为“画廊”就是博物馆。而“珍奇屋”则指一个正方形的房间里面布满了填充式动物标本、珍稀植物标本、小型艺术物件、人工制品和古董等,对应的德文是“Wunderkammer”,多指王公贵族、教皇和富豪的玩物存放之地。如果从收藏物承继和观念影响方面看,“珍奇屋”对此后博物馆文化的发生影响更大。该问题放在后面的文章中具体讨论,在此从略。

二、场所、机构或空间

如果博物馆内涵的丰富、复杂及不确定性在博物馆起源上的混乱及范式多见,可解释为见仁见智的话,那么关于博物馆是“场所”“机构”或“空间”的观点更加莫衷一是。一定程度上,该议题构成了博物馆内涵丰富、充

满歧义的表征之一。

博物馆为“场所(place)”一说起源较早,几乎随博物馆发生而发生。1634 年,克莱蒙斯(C. Clemens)在其著作中指出“博物馆(museum)”最准确的含义是“缪司^①诸神寓身的场所”^[9]。1706 年,在英文词典《词汇新世界》(New World of Words)里继续了博物馆为特定“场所”之说。该词典的“博物馆(museum)”条目解释:“学习室、图书馆以及学院,或者是学者常去的公共场所”(a study, or library, also a college, or public place for the resort of learned men)。不同的是添加了“公共”一词,表达了近代博物馆形成后的公共特色。但是,该词典在描述阿什莫尔博物馆(the Ashmolean Museum)时,却更多强调了建筑,即“牛津市的一处整洁的建筑”。至 1755 年,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编著的《英语词典》(English Dictionary)中,“博物馆”词条的解释变为“蕴含丰富学问的奇异物品的贮藏和陈列场所”,则开始着重强调博物馆收藏和展示奇异物品的功能。至 19 世纪,在阿什莫尔和小约翰·特拉德斯坎特(John Tradescant Jr.)之妻赫斯特(Hester)就特拉德斯坎特家族收藏归属进行诉讼时,英国法院对“博物馆”的解释变成了,是一个“贮存和收藏各种自然、科学与文学珍品或趣物或艺术品的场所”^[10]。添加了自然、科学、文学及艺术品等详细的物品种类,但是,仍然界定“博物馆”是一个“场所”。安来顺先生在文章中强调“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分享和学习的场所:

博物馆是一个“讲故事”的文化机构,讲述古往今来人们如何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以及怎样生活的故事,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良知的代表者。通过陈列展览等方式,在博物馆与其收藏之间形成新知识、新文化,在诠释传统文化的同时诠释新的文化。依赖于社会对其高度的信任感,成为一种重要的分享和学习场所。^[11]

在近期讨论新的博物馆定义时,安来顺先生指出:

讨论中的关键词不是特定的建筑和机构意义上的博物馆,而是作为一种强有力暗喻,作为一种工具,社会赖此表现自身的历 史和与其他文化的关系。^[12]

① 即缪斯(Muses),希腊神话中的女神。

博物馆史上较早明确提出博物馆为“机构(institution)”说的是史密森博物学院(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乔治·布朗·古德(G. Browne Goode)，在其发表的《博物馆管理原则》(The Principles of Museum Administration)一书中，界定博物馆是“保存能够最好地显示自然现象和人类工作的物品，用以增加知识和培育启迪人民的机构”^[13]，使用了“机构”一词，“机构”说开始产生影响。此后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诸多定义、美国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英国博物馆协会(Museum Association)、日本、苏联、澳大利亚等国均持博物馆为“机构”说。195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定位为与图书馆、档案馆等平行的“收藏保管机构”；1971年，又再次在定义中申明博物馆是“机构”。《苏联大百科全书》(Bolshaya Sovetskaya Entsiklopedya)明确定义博物馆是“征集、保藏、研究和普及自然历史标本、物质及精神文化珍品的科学研究机构、科学教育机构。这些标本和展品是人们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资料”^[14]。《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也界定博物馆是“现代社会为了尽可能防止那些具有文化价值的实物变质与损失而建立起来的机构”。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委员会权威定义博物馆“可指一般为了进行筛选、研究与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证据的制度或机构”^[15]。

作为博物馆文化后发生地，中国博物馆在引进伊始，更多接受的是博物馆为“机构”说。早期学界多数把博物馆看作是“搜求器物、博览兼收、益智集思”的机构，如蔡元培先生就明确表示博物馆是教育类机构。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现第一个博物馆发展黄金时代时，成立的中国博物馆协会明确博物馆是一种“文化机构”，强调它不是专为保管宝物的仓库，而是以实物的验证而做教育工作的组织及探讨学问的机构^[16]。1956、1961年的中国博物馆定义同样承续了“机构”说^[17]。1979年国家修订颁布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重申了1961年博物馆定义的“机构”说。1985年出版的《中国博物馆学概论》和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均持“机构”说。

博物馆为“空间(space)”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一是哲学意义上的空间。西方“空间”概念最初属于哲学范畴，在中文语境中通常是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是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延伸性的表现”^[18]，偏重于物理意义上的空间。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本身是不可视、不可触的，只有被可见物充填和区隔后，“空间”才有意义。“空间”不是物质，与“场所”有着明显差异。“场所”可由“空间”演化而成，人们常聚或常住的空间可以转变为场所，即场所是以人作为充填“物”来体现存在的空间。空间意义上，博物馆空间正是由人参与的特殊场所，甚

至可以将博物馆简单化为物理空间上的建筑空间^[19]。

哲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远比物理意义上的复杂,尤其是在西方哲学理论中,偏重于抽象“空间”观念是一个极富延展性的批评话语。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空间理论提出哲学意义上的空间具有无限扩大的可能,既可实指也可虚指,如可以将空间分为休闲空间、工作空间和交通空间,也可分为心理空间、精神空间、文化空间等^[20]。博物馆作为空间而言,最有特色的应是其叙事空间。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社会空间论来看,博物馆的叙事空间是一个拥有特殊话语权力的公共空间,即是可以重塑话语权的社会公共空间^[21]。拥有话语权的博物馆空间基于此已脱离了具体的建筑空间,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及历史学考察的一个复杂现象。在此社会空间,展览成为博物馆的一种特权,它通过展览策划,使博物馆话语合法化。在此,博物馆展览又涉及殖民空间、性别空间等。正是空间话语表征权力,自19世纪中期始,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等需要被重新表征的人群,开始关注博物馆的空间变革^[22]。在多元文化多元需求的拉扯下,博物馆已然成为充满争议话题的公共空间。在当下虚拟空间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博物馆又被赋予了与虚拟空间相对的实体空间特性,博物馆空间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为了更好地理解博物馆是“场所”“机构”或“空间”的观点歧异,可回归博物馆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依据不同历史时段的博物馆特点来思考。博物馆形成早期,重心在于稀有之物、古物或圣物的搜集、保存等,有限的开放多带有知识或权威的炫耀色彩,此时处于主流的应是博物馆为特殊“圣所”的观念。19世纪工业文明占据主导后,博物馆开始思考在民众中的知识传播和普及问题,自觉履行博物馆作为公共场所的职责,强调自身组织的公共性,由此博物馆“圣所”变成了更加开放的“场所”。观念变革预示着博物馆开始降低准入门槛,允许更多的民众分享博物馆制造的知识,博物馆由此成为文化社会化的一个典型公共场所,为公共所有、为公众所用,在博物馆中展现的任何物均可为人所见、所闻等。至20世纪,博物馆形成了专业门类、组织特性及管理手段等,拥有被视为社会管理机构的体系,“机构”一词随之超过“场所”,使用频率提高。一定意义上,作为“机构”的博物馆,承载着所在国家更多的愿景,努力体现社会的主流意志。国际博物馆协会1974年博物馆定义中固定下来的“为社会及社会发展服务”的修饰词,正是从“机构”层面赋予博物馆的责任。而“空间”说产生时间上相对较晚,尤其是哲学意义上的“空间”观念,只能是博物馆发展至一定程度后的一种反观。当然,博物馆“场所”也可理解为由各种具象物组成的有特殊作用的、可组织特定活动的“空间”。挪威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就认为博物馆的“空间”特性恰恰是作为人与“场所”之间联系的纽带^[23]。荷兰博

物馆学家彼得·冯·门施(Peter von Mens)则提出:

在论及博物馆时,可将博物馆区别为文化内涵与结构形态。文化内涵涉及价值、规范、意义和职能,即博物馆是机构;结构形态涉及部门设置、职务等级,即博物馆是组织。结构形态特点反映着机能的合理性,而文化内涵则反映了真实的合理性。^[24]

从机构与文化内涵表达、组织与部门设置关系上分析了各自不同的博物馆观念。

三、博物馆功用

作为博物馆概念内涵的重要内容,此处的功用包括职能和功能两部分,职能系博物馆内在的本质性作用,而功能则更多侧重界定博物馆应该和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即博物馆与外界的关系界定。自博物馆产生始,对其功能的界定表述活动就未曾停止。此议题同样充满复杂性及不确定性。

关于博物馆职能与功能的区分,常常被混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职能属于博物馆本身具有的作用,强调对博物馆内部的作用^[25];而功能涉及博物馆与社会关系问题,即能够为外部世界做什么的问题。职能相对稳定,而功能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关于博物馆功能表述的不同更多是围绕着它的功能产生的。两者的区分是厘清博物馆功用认知混乱的基础。

早期博物馆多致力于藏品的搜集、保存和研究,更多表现在内部职能上的发展,与社会关联度不大。而博物馆功能是在博物馆社会化之后才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的。当下,博物馆功能包括保护、教育、研究、传播、娱乐等诸多方面,但是,国际上对博物馆功能的理解尚在不断变化中:

作为启蒙运动时期的产物,博物馆通过其最基本的研究功能——对世界上的珍品与瑰宝进行搜索、命名、收集和分类——尝试拓展和加深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和大学一样,博物馆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今,博物馆的这一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其作用日益增大,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日益减小。^[26]

1888年,古德先后发表《博物馆历史和历史博物馆》(*Museum, History and History Museum*)、《未来的博物馆》(*The Museum of the Future*)及《博物馆

管理原则》等,系统论述了博物馆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博物馆管理原则》一书中,古德把“博物馆”定义为“保存能够最好地显示自然现象和人类工作的物品,用以增加知识和培育启迪人民的机构”,同时还特别强调“博物馆存在的前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群体,博物馆在任何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都是必需的”^[27]。1904年,英国格拉斯格考古学会主席戴维·莫里(David Murray)发表三卷本的《博物馆的历史及其利用》(*Museum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use*),则高度肯定了博物馆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及娱乐公众的功能。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后,立即着手制定行业认同意义上的博物馆定义。遗憾的是,当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第一个定义偏重于界定博物馆物的分类、博物馆类型的列举等,肯定了博物馆收藏的职能,但缺乏明确的博物馆功能表述。可能意识到功能限定上表述的缺乏,难以规范博物馆的业务,在1951年定义修订中国国际博物馆协会开始着重强调博物馆的功能,以存在目的的方式表述博物馆功能是“供观众欣赏、教育”。随后历次定义修订中又添加了“研究”:“以研究、教育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管具有文化或科学价值的藏品并进行展出的一切常设机构,均应视为博物馆。”而在其影响较大的1974年定义中,首次明确区分了博物馆的基本职责和目的:

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 and 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之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

在此不但设定了博物馆的总体目标“为社会 and 社会发展服务”,同时将收集、保存、研究界定为博物馆的基本职责,明确将教育、欣赏等表述为博物馆的外部功能。这种职能与功能的明确区分,影响很大,1974年定义因此被视为博物馆由关注内部职能转向重视博物馆与社会关系的开端。美国学者阿尔玛·威特林(Alma Wittlin)认为:

如果我们同意这个定义(1974年定义),那么,不论它的性质如何,凡不发挥物的作用,或者不把它作为信息的主要传递者的机构,就不是博物馆。一个置观众于变色灯、水银灯或播放与实物风马牛不相及的音乐的场所,也许使观众享受到新的乐章或欢乐,但是,根据它的性质,它不是一座博物馆。^[28]

关于博物馆功能的探讨,除国际博物馆协会外,其他国家和博物馆组织也均有不同的表述。1951年日本博物馆定义中,将博物馆职能界定为“收集、保管、陈列展出”,而将功能界定为“教育、研究和娱乐等”,在博物馆功能上增加了“娱乐”一项。而美国、德国等更加强调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如德国博物馆协会(Deutsche Museum Association)在博物馆定义中提出:“作为观赏的收藏必须有明确的教育功能。”随后英国博物馆与美术馆委员会(the British Museum and Art Museum Committee)博物馆定义中用“阐释”替代了“研究”功能,同时添加了“记录”功能。随后,该委员会再次修订博物馆定义时又加上了“开发信息”功能,并首次明确提出博物馆“对藏品及相关信息承担着社会信托责任”。澳大利亚博物馆协会(Museum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则认为博物馆具有解释世界,以便使民众“理解世界,解释过去和现实,并探索未来”的社会职责。以上均有效地更新和补充了国际博物馆协会有关博物馆功能表述的缺陷。

近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界定博物馆新的功能还延展至博物馆的文化认同、公众教育功能等:

博物馆必须在世界文化快速变化中加强自己的文化意识,在国际化的国家体系中加强民族身份认同,并在全球性发展中,发挥自己特定的社会教育作用。博物馆的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建立在一种全球性或世界性的秩序意识上的。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普遍起到的主要作用是构筑对特定民族国家群体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秩序和集体身份。博物馆的诸种功能(搜集、保管、研究和陈列)都是为这两个目的服务的。^[29]

博物馆公众教育功能将放在本书后文中详细阐述,在此先探讨博物馆的文化理解和认同功能。马丁·普洛斯勒(Martin Prossler)曾把博物馆构建世界秩序的作用,历史性地追溯到其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形成特殊作用,即“借助物品”来形成一个“实现、理解和传递”世界意识的“认识空间”^[30]。博物馆作为联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最重要社会存在之一,其终极使命应是通过保护、传承并帮助认识作为人类及其环境物证的多元文化。从文化认同角度审视博物馆可以发现,

(博物馆)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物证的直接面对,是跨越时空的历史记忆的场所,尽管作为文化设施的博物馆是一种公益性的社会机构,博物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人类集体的行为,

但是这种记忆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31]

据此,博物馆成了保护和展示人类物化史的特殊空间,可为人类提供一个穿越时空,重新俯瞰人类历史的特殊途径。在此借美国诗人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一段话来表明博物馆此种功能:

假如给我三天时间,我将在有视觉的第二天,向过去和现在的世界匆忙瞥一眼。我想看看人类进步的奇观,那变化无穷的万古千年,我还要通过艺术来搜寻人类的灵魂。这么多的年代,怎么能被压缩成一天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32]

随着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文化认同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早在1545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的宫廷史官、文物收藏家利兰(John Leland)就意识到,“珍藏一定数量的优秀历史文物就是为了让世界知道英格兰有如此鲜明的高雅与美德”^[33]。法国大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后更是将卢浮宫视作重要革命成果,展现法兰西之伟大、国际形象重构的工具。时任内政部长1793年写信给卢浮宫艺术博物馆委员会道:“艺术品集中展示意义非凡,让那些来巴黎参加庆典的人们惊愕于我们的珍宝,也让他们认识到,当前的政治问题并没有影响和削弱我们的艺术修养。”^[34]从文化上建构人们新政权认同的意识明显。近代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就发现了中国传统中强大的文化认同功用,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在其著作中评论道:

中国并不像非洲和土著人的美洲,甚至不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那样,只是集合在一起的一群部落,后者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感受。中国是一个整体,公共生活的强大潮流席卷了它所有的成员。……没有任何地区对于中国靠共同语言和共同情感而产生的巨大心脏搏动不做出迅速反应的。^[35]

19世纪初,“民族国家”概念形成,如何增进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博物馆由于构建新的群体认同功用,成为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群体想象”场所和空间^[36]。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将博物馆与墓地、纪念日一起归入自然、实在感官体验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emoire)”。诺拉强调记忆之场的“场所”一词与生命和死亡、时间和永恒密切相关,同时也是集体性与个体性、神圣与世俗、静态与动态的集合体。“记忆之场”的组

合或展示,不但可以维系群体的记忆,因常有国家权威或某种利益强加其上,同时又成为“记忆”的避难所或是朝圣的圣殿^[37]。博物馆因此通过记忆保存,得以超越时间将之沉淀成为民族的共同记忆:

作为记忆空间的博物馆因此塑造了有序的记忆,使相对松散的公众表达转变为集体记忆的建构,最终与回忆录、图像、纪念物、仪式活动、纪念日等成为维持与传递记忆的媒介和途径。^[38]

19世纪后,新建博物馆正是以保存记忆为使命,通过将民族国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物件尽收其中,再以物品收藏记录民族群体在时间和空间的存在,继而成为国家权力体制的最佳象征之一。现实中,国家博物馆既是国家权威和合法性的象征,又是国家历史秩序的展示场所。具体而言,博物馆可以通过象征性的物,进行特殊的历史叙述和构筑,建立起与他民族群体相区分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集体身份,从而完成叙述民族历史和构塑民族身份的政治文化使命。博物馆历史上不乏其例,如1853年,在纽伦堡(Nürnberg)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博物馆(Deutsche National Museum)就充满了民族国家身份独立的意味。该博物馆建立时德国刚完成统一,选址纽伦堡建博物馆,带有明显的将新统一的德意志想象为传承德意志第一帝国的光荣传统。两年后,马克西姆林二世(Maksym II)又在慕尼黑(München)建立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Bavarian National Museum),以此强调与巴伐利亚有关的魏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er)皇脉继承。更典型的例证是1862年在华沙(Warsaw)建立的波兰“国家博物馆(Muzeum Narodowe Warszawie)”,此处的国家博物馆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建馆时波兰已被俄、普、奥瓜分,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所谓的“国家博物馆”的一部分收藏品只能存放在瑞士,此处的“国家博物馆”被波兰人民用来表达国家独立的一种美好愿望。回到当下,国际上更加重视博物馆为国家教育国民、塑造认同的政治功能,2010年,匈牙利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启动“欧洲国家博物馆:认同政策、利用过去与欧洲公民(European National Museums: Identity Politics, the Uses of the Past and the European Citizen)”项目,专题调查研究欧洲国家博物馆对增强欧洲社会凝聚力、提高身份认同的功用。该项目在博物馆观众调查中发现,多数被调查者高度认可博物馆在重新构建国家间联系、增强欧洲凝聚力的独特功用^[39]。

作为人类物化历史的特殊保存、研究及展示机构,博物馆的精神慰藉功能同样不容忽视。关于博物馆精神慰藉作用的机理、途径等尚未有专门的讨论,但是,从人类特有的怀旧和记忆需求来看,博物馆收藏、展示的对象物

所承载的人类过往信息应是产生精神慰藉作用的核心要素。如果人类历史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段,当人们对所处现在变得无法承受时,可为精神或思想提供避难空间的只有过去或未来。柏拉图(Plato)选择了未来,并在未来建构其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以暂时逃避对现实的失落。但是,更多的人倾向于选择过去,即通过回忆回到熟悉的场景,从而避开现实的烦恼,如早在希腊文化中出现的关注自身过往历史真实问题的探讨。巴赞(Germain Bazin)指出人类与动物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可以通过他曾经是什么来知道他当下是什么从而得到自我慰藉,因此高度肯定博物馆对人类的精神慰藉作用:

文艺复兴试图穿越十个世纪的时空隧道,以发现被中世纪基督教否认的过去,从而出现复兴古代文化的转向。古代再次成为人类的避难所,为了寻求割裂的当下的过去,文艺复兴的人们开始重视古物的搜集、研究,从而使作为被遗忘的古典主义的庇护所的博物馆获得了新生。^[40]

另一方面,博物馆空间同时也是知识与思考相互碰撞的空间,如尼古拉·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就认为遁入美术馆和雕塑馆的秘境,是为了仿照希腊时期的做法,从而更好地在孤独中进行思考:

夜幕降临,我回到住所,走进更衣室,脱去白天所穿的泥泞不堪的衣服,重新穿上宫廷服饰。如此盛装打扮一番之后,我步入古代先贤的殿堂。在他们的殷勤招待下,我饱餐一顿,食物完全符合我的口味,我亦为此而生。置身于此,我毫无羞赧地与他们交谈,询问他们各种行为的动机何在,他们的解答充满人情味。一连四个小时,我丝毫不感到无聊。所有苦痛皆抛到九霄云外,贫穷,甚至死亡也不能让我畏惧。^[41]

表达了其在历史古物中避开了现实的困扰,获得了精神慰藉和愉悦。如同在时间静止的神殿中,博物馆促使人们瞬间得到文化顿悟,感受置身愉悦之中。1768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参观拥有皇家艺术收藏的德累斯顿美术馆后的记述和感叹如下:

当焦急等候多时的开门时刻终于到来时,我的钦慕超过一切的预期。退出世俗,居关保守的沙龙,华贵而保护得这么好,新镀